



名家访谈

语文新诗教学和学生新诗写作漫谈

——方长安访谈录

◎方长安 黄旭午

方长安,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《写作》《长江学术》主编,武汉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主任;中国作家协会会长,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,湖北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。主要从事新诗研究、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。出版专著9部;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,其中40余篇被《新华文摘》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、《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》《文艺理论》等全文转载。主持完成2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、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课题,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。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(人文社会科学)、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、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等。

黄旭午:方老师好!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。前不久,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美国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(Louise Glück),您是新诗研究专家,我们今天就聊聊新诗。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会颁发给一位诗人?

方长安: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位诗人,很正常啊。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,直抵生命本真,书写存在的奥秘,是人类自我表达最凝练的方式,历史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不少啊,比如我们中学生熟知的印度诗人泰戈尔。所以,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。

黄旭午:我发现“传播”“接受”是您学术研究的两个关键词,您为什么特别关注新诗的传播接受问题?

方长安:研究新诗是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一个传统,陆耀东先生、孙党伯先生、於可训先生在新诗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,我的导师龙泉明先生是研究新诗的著名学者。那么,我为什么致力于新诗的“传播”“接受”研究?因为在新诗研究界,诗人研究、作品研究和诗潮研究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,而关于新诗的“传播”与“接受”研究则较少。我们知道,新诗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,它的发生、发展与传播接受是分不开的。读者接受的信息反馈到创作者那里,势必对其创作心理和艺术想象产生一定的影响,进而影响到新诗的审美建构与艺术走向。长期以来,这方面的研究很少。基于这一状况,我才将新诗传播和读者阅读接受作为研究的重心。我的兴

趣不只是传播接受本身,而是努力从传播和接受维度窥探新诗内部结构特征,看看新诗情感空间、审美形式、艺术风格是如何生成的。传播和接受研究属于新诗的外部研究,但我并没有把这种外部研究孤立起来,而是努力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打通,目的是让我们对新诗的内部有一个新的思考,找到深化内部研究新的突破口。2006年开始,我在《学术月刊》《学习与探索》等刊物组织新诗研究专题,算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起点;2009年,我申请获批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“中国新诗接受史研究”,并陆续出版了《新诗传播与构建》《传播接受与新诗生成》《中国新诗(1917-1949)接受史研究》等著作,致力于打通新诗的内外关系。

黄旭午: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新诗非常流行,写作和阅读群体庞大;时至今日,新诗遭到冷落,方老师,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方长安:冷落也谈不上吧。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,目前写新诗的人还是很多的。你看我们湖北省潜江市,一个县级市,起码就有100多位热衷写诗的人,其中一些人的诗还写得非常不错,不少人在《诗刊》等发表过作品,出版过诗集。其实,现在写新诗的人还是很多的。互联网这个传播媒介,也刺激了诗歌的创作与发表。据我了解,生活中很多人经常写诗,并将作品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,与人共享。有些人天天读诗写诗。由此可见,现在写诗歌的人还是很多的。网络化时代,人们有很多阅读选择,也有很多自我抒发的途径,诗歌应该说是其中之一,虽然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火热,但是也不能说遭到了冷落吧。

黄旭午:喜爱写诗的人的确不少,但读诗的人却在减少,什么原因呢?

方长安:这个现象,我觉得可能与文学的

发展状况有关,也与读者阅读接受状况相关。不仅仅是诗歌,八十年代读小说的人也很多。那个时候某个人发表一篇小说,大家都觉得很了不起,是不是?如果你那时在《长江文艺》发表了一篇小说,自己感觉会非常好,别人也非常仰慕。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,你现在发表一个作品,发表一首诗,发表一部小说,别人也不会觉得了不起。九十年代以后,市场经济发展起来,文学确实开始边缘化;新世纪以后,电视和网络上形形色色的节目,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,它们成为了文学阅读的替代品。有了这些新的网络产品,人们就不一定像过去那样去读传统的纸媒文学了。比方说中央电视台的法制栏目,里面有很多生活中真实的故事,这些故事,在以前是通过小说展示出来的。网络上的各种娱乐节目,诸如抖音,朋友圈里的各种新闻信息,成了传统小说、诗歌等的替代品,它们一定程度上转移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与需求。现在读诗的人少了,也是正常现象。

黄旭午:也就是说,互联网发展到智能手机时代,文学作品阅读被信息阅读替代了?

方长安: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,现在写诗的人还是很多的,但是读诗的人多不多?可能不多。写的人确实不少,但写出来谁来读,可能是一个问题,需要辩证地理解。诗人写诗肯定有写诗的冲动,在写作中释放内在情绪,表达某种愿望。诗歌写出后有一个传播问题,它与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关,与一个时代的传播媒介相关,智能手机时代,诗歌作品的传播比以前更便捷,发生影响的方式与效果也更复杂,这需要认真研究。我们正在准备启动一个项目,调查当下诗歌写作与读者阅读状况,调查诗歌与读者文化生活的关系。有多少人读诗歌,读哪些类型的诗歌,他们如何理解诗歌与生活的关系,如何理解诗歌与时代发展的关系,与人的精神结构形成的关系。

这是一个与社会文化发展相关的问题,与民众文化素质提高相关的问题。互联网智能化时代,大众的文学阅读兴趣与倾向是否发生了变化,如何变化,诗歌阅读在大众阅读中占多大比例,这些都需要调查与研究。

黄旭午:今年全国都在正式使用人教版2019年版部编教材,第一单元是诗歌单元,与2004年版实验教材相比,有很大变化:部编教材安排的中国新诗是郭沫若的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、闻一多的《红烛》、昌耀的《峨日朵雪峰之侧》,《雨巷》《再别康桥》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撤掉了。您怎么看待这种变化?

方长安:将《雨巷》《再别康桥》等撤掉,编者可能是从作品内容、格调的角度考虑,是不是觉得它的调子相对来说比较低沉?闻一多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,《红烛》是爱国诗歌;郭沫若的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更为开阔、豪放。作这个调整,编者可能是考虑到中学教育的实际情况。中学生文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他们积极、健康的人格,培养崇高的审美趣味,进行爱国主义教育,所以,选择的作品基调要高昂些。外国诗歌的入选,可能是考虑到拓宽中学生文学视野;昌耀是当代著名诗人。这个单元新诗安排,有现代的,当代的,还有外国的,比较全面。编者增删作品,肯定有他的考虑,这个考虑与中学文学教育的目的肯定有关系。

黄旭午:部编教材对新诗作这样的调整,中学老师该怎么教,方老师,有什么好的建议?

方长安: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这首诗,是郭沫若早期诗歌中一个代表性作品,表现了一种磅礴的气势,一种精神气概。你想想,这首诗的标题“立在地球边上放号”,意思是抒情主人公站在地球边上吹号子,站在地球边上面向银河和整个宇宙吹号子,展现五四新人的一种新

姿势,表现了人的解放、人的能量、人的气概,展现的是空前绝后的新的世界观、宇宙观。他是对力的一种张扬,来自人的生命内部,是人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的展示。《雨巷》比较低沉;《再别康桥》也是表现知识分子情感,基调哀婉,但郭沫若这首诗,他张扬主体的力量,展示的是“五四精神”,是“五四”时期人的伟力的张扬。

黄旭午:部编教材没有选“朦胧诗”代表诗人舒婷、顾城、海子等的作品,而是选了当代诗人昌耀的《峨日朵雪峰之侧》,你怎么看?

方长安:昌耀的作品是很好的,从艺术的角度看,无论外在还是内在都是非常优秀的。“朦胧诗”对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影响比较大。对于主编而言,培养中学生积极、健康的价值观,是他要考虑的。他可能考虑更多的是作品的格调与审美风格,考虑作品对青少年精神上、情绪上的影响。其实,《雨巷》《再别康桥》艺术成就非常高,但是主编他要这么改,肯定还是有他的道理。比方说,海子的诗歌,中学生可以读,肯定可以读,但是不是最适合中学生读的诗歌作品呢?那就不一定。他的作品很好,但是,你编这个书给谁看?这个很重要,如果阅读对象是30岁40岁的人,那就无所谓,但是中学基础教育不光是文学知识的传授,还承担着积极健康人格的培养,我觉得编者可能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。比方说海子的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,就不适合中学生,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,这题目看起来很阳光,但是,这首诗基调、格调则很复杂。真正读懂这个作品,会发现它传达的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绝望情绪,所以,它不适合入选中学教材。

黄旭午:部编教材把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撤换掉了,基于什么考虑?

方长安:这个问题,我不好回答,只能揣摩。我觉得没必要撤掉。撤换掉,基于什么目的、理

由,不太清楚。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从内容上看肯定没有问题,它是对处在社会底层的保姆的歌颂、赞美,它的气势、情感很丰富。我想撤掉的原因,第一,是不是篇幅有点长;第二,审美把握上有分歧。这个作品有不同的看法,有的人觉得艺术、审美上很好,有些人则不这么认为。他那种大量排比句式的使用,从诗歌写作来说,是不是值得去倡导的一种倾向?编者肯定不会从内容考虑,而是从诗歌艺术这方面去考虑的。我觉得中学课本里面的诗歌,短小一点,抒情一点,内容、艺术上更凝练一点为好。

中学教材的编者编选诗歌,首先考虑的大概是内容与格调。什么样的作品适合中学生?它不光是让学生获得关于诗歌的一些知识,还要有助于培养他们积极、健康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人文情怀;其次,考虑的是诗歌的艺术性。

黄旭午:新诗的教学,高中老师处理比较随意,有的注重读和背,有的偏重分析和讲解,还有的浮光掠影过一遍。方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中学老师?

方长安:新诗教学,可能对一部分中学老师有点难度,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教授。我个人觉得中学教育是基础教育,刚才所讲的,最重要的应该是两个方面,第一是对学生积极健康的价值观的培养,第二是审美趣味的培养,两者不可偏废。那么,这个价值观、人文情怀的培养,需要通过作品去发掘,通过作品去影响学生。当然,审美上,你需要把作品的特征、风格讲出来。这对于中学老师,可能是一个挑战。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一些途径,比方说,你把新诗和旧诗进行一个比较,很多老师喜欢古体诗词、旧体诗词,觉得古诗读起来朗朗上口,也比较容易给学生讲授,内容也容易把握。现代新

诗语言文字上没有什么问题,但是内涵是什么?其实很难把握。把新诗和旧体诗放在一起比较,你会发现他们各有所长:旧体诗歌,为什么我们觉得它好读好讲?第一,与新诗相比,旧体诗有固定的、稳定的形式,读起来朗朗上口,它的意象比较鲜明,画面感强。第二,从内容上讲,很多旧体诗表现的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、宁静和谐的那种生活情调,还有表现伦理层面上的日常生活,比方说,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,生活层面上,谁都能够认同它;价值观层面,谁都觉得它好,是不是?再比方说,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,抒发了中国人共有的一种情怀,你只要有相似的一种经历,就很容易懂它,理解它,体会它,不需要老师去讲,表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共有经验,具有普泛性。新诗呢?它不是这样,它写的是个体诗人在特殊的时空之中特有的一种情绪,它所表现的内容大都不具有日常性、普泛性特征,它是个体独特情感的一种表达。新诗表现特定时空之中喜怒哀乐的情绪,它不可能具有共同性,这是新诗难读懂的一面;其二,它的表达方式独特。比方说象征主义,比较难懂,它是用一个物来暗示另外一种观念、一种情绪、一种情感,那种暗示性让你无法去把它读懂;另外,现代诗人,很多在写作中传达某种抽象的观念、思想,这种观念、思想和读者有距离,如果不了解诗人的思想背景,那你可能很难读懂。比方说,某个诗人他写诗的时候,表现西方存在主义思想,存在主义观念影响到他对生活的理解,如果你没有这种知识背景、思想背景,你想去读懂它,那肯定是很困难的。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导致有些老师讲解不了新诗的一个原因。其实主要还是自己不太懂,你如果是用一种鉴赏传统诗歌的眼光,从旧体诗词所获得的一种经验来解读现代诗歌,那就比

较困难。阅读新诗有什么方法,我觉得很难说,对吧?这个可以借助于一些参考书,其实中学课本里面新诗的数量也不是很大,做这个工作并不困难,比方说,讲解闻一多的诗歌,你先了解闻一多的生平、艺术追求和创作的时代背景,把他的新诗理论主张搞懂,还可以看看别人对他诗歌的评价,这样,讲解他的新诗就不难了。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,具体到诗人某一首诗歌作品时,看看它在内容、审美上提供了什么新的、独特的东西,你发掘出来,然后传递给学生就可以了。做好这些工作,讲解新诗就不难了。

黄旭午:也就是要知人论“诗”,问题是老师的讲解让学生有距离感,学生更倾向于自己获得的真切体验,如何来平衡这种关系?

方长安:我觉得老师要引导。中学生可以自己理解诗歌,这个很重要,要尊重他们。但是他的理解也有可能与文本本身存在一些偏差,老师肯定要去引导。如何平衡,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其实在大学里面也存在这个问题,你要有一个知识背景的介绍,比方,一首诗,要了解诗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,他为什么写这首诗?有些关于诗人的知识背景,需要介绍一下,引导学生自己去理解。老师倒不一定说要把它分析得非常透彻,但是你把知识背景介绍完以后,可以提供几种理解的思路,便于让学生自己去理解。老师不一定要非常系统、透彻地去讲解它,因为一首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,它有好多种解读方法,比方说《雨巷》这首诗歌,你可以说它是一首爱情诗,一首情诗,也可以说它是表现一个人理想追求过程中情绪的起落。丁香一样的姑娘是一个象征性意象,你觉得它象征着什么,如果从你的阅读经验出发,从你的生活经历、经验出发,只要讲得通都可以。我

们要尊重学生的感悟力、理解力,进行合理的引导,以提升其艺术鉴赏力。

黄旭午:新诗教学过程中,可能涉及到一些专业词汇,比如说诗歌的节奏感、跳跃性、象征暗喻,老师要不要把这些东西给学生讲?

方长安:这些内容肯定要讲,就看怎么讲。基本的修辞方法,我个人觉得最好是结合作品讲。你抽象出来,孤立地讲,流于空泛,对中学生而言效果肯定不好。所以,最好用具体的、有代表性的作品讲。比方说节奏感,结合一个完整的作品,该怎么讲?古典诗歌有古典诗歌的节奏,现代诗歌有现代诗歌的节奏,那么这个节奏到底怎么理解?因为现代诗歌从它发生的那一天开始,和古典诗歌的节奏,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。现代诗歌注重自然性,所谓合乎自然呼吸。人有生理上的自然节奏,你说话、你呼吸都有这个生理上的自然节奏性。旧体诗受格律影响,秉持严格的节奏观念,新诗不讲这个,它一切要顺服自然,这个自然,和我们生理上的语气表达节奏有关,讲这个,要结合具体作品,如果不结合作品,学生很难理解。节奏是诗性生成的重要途径,把握节奏需要从生命特征出发,从诗性建构着手。

黄旭午:部编教材设置了学习任务群,其中一个学习任务是文学阅读与写作,要求学生学习写作诗歌。教师要如何引导学生写作新诗?

方长安:新诗创作,看起来容易,其实很难。你要写出一首自己满意又让别人觉得很好的作品,很难。为什么这么说?新诗发生的时候,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倡导者胡适,别人向他请教怎么作新诗,他的答案是,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。这是一种没有原则的原则,意思是你只要会说话就会写诗。胡适的作诗观点和我们传统的写诗原则、经验不同,他把中国古典诗歌里面的那些规则、规范全部打破了。你怎么讲话你就怎么写诗,谁都

可以讲话,谁都可以写诗。今天那些口语诗歌怎么来的?其实,从源头讲,是从胡适那里来的。写新诗,首先,要用白话来写;其次,它是自由体,不太注重押韵,换句话说能够押韵就押,不能押韵就不押韵。新诗讲求自由,没有规则,你要自然地、独具个性地进行情绪表达、内容书写,而且要写出诗意,这就不容易了。如何引导学生写新诗?方法在哪里?其实没有什么方法,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遵从自我生命表达需要吧。

前几年,我有一个学理工的朋友,他有学习古典诗歌的经验,但不敢写古典诗歌。后来,他接触到新诗以后,按照“想怎么写就怎么写”的原则,尝试写新诗,后来爱上了写新诗,于是天天写,也不管写得好不好,他觉得新诗这东西太好了: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可能他确实有一种情绪、情感表达的需要,按自己的想法直接去表达,表达出来了,他就很高兴。所以,写新诗,没有一套方法,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就这么简单。但是要写好,写出真的诗,有没有规则呢?也不能完全说没有。写新诗的规则不是什么夸张、暗示、押韵……不是修辞技巧问题,那是什么呢?我觉得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就是陌生化。你写诗歌时,在遣词、造句、句式上要追求一种陌生化。所谓陌生化,就是写新诗时,使用的语言和我们日常的语言,和平常使用的合乎规范的、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句式不同。如果你诗歌的语句是日常生活的公共的语句,或者书面的、合乎语法规则的语句,那它就难以生成诗意。为什么很多白话诗歌,你觉得没什么诗意、诗性?因为,它使用的句子跟你讲的话是一样的。你一定要讲出别人讲不出来的东西,你的句子、句式要不同于他人,比方说主谓宾错搭,虽说可

能是个病句,但也许恰恰充满诗意。要给读者一种陌生感,一种冲击力,读者才会品味它,回味它。老师教学生写诗,可以把这个原则性的东西讲给他听。废名的《十二月十九夜》这首诗,有一句“炉火是墙上的树影,是冬夜的声音”。冬天的炉火怎么成了墙上的树影?这不合常理,日常生活中不可能这么说。倒映在墙上的树影是一种传统诗意,但他不满足这个,他说炉子里面的火是墙上的树影,就有新的冲击力,艺术感很强。炉火是墙上的树影,你说这东西到底是什么?你能说清楚吗?你说不清楚,你怎么讲都讲不清楚,讲不清楚的东西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诗意的东西。这个诗意与我们古典诗歌诗意不同,它是现代的,正常人不会这么说,即使是强调,也不会这么说,这个就是陌生性。废名这首诗里面还有一句“思想是一个美人”,意思是思想是个好东西,但没人像他这么表达。生活中,我们说花是美人,美人是花,这很老套,是不是?当思想和美人联系在一起,说“思想是一个美人”,这句话就有了诗意,这就是陌生化的效果。创造一些陌生的句子,让别人去回味,去琢磨,这可能就是诗意生存的一个法则。

黄旭午:方老师这么一讲,我觉得我也会写诗了。

方长安:写新诗,首先想的是“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”,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;其次,写的过程中追求陌生化。整首诗不一定很好,但总有一两行闪亮的句子,也可以。教学生怎么写诗,在我看来,暗示、夸张、对比、排比等并不重要;个体生命感受、体验最重要,尊重自己的感觉与体验,进行独特的表达,有生命质感的陌生化表达,在陌生化言说中创造诗意。

黄旭午:中外诗歌因为文化背景不同,同一意象,它所表达的感情有别,对于外国诗歌的教

学,您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?

方长安:中学语文教材上的外国诗歌一定是精心挑选的名家作品,作品主题要么是爱国主义,要么是抒发人类的共同情感,或者是描绘大自然……虽然民族不同,文化背景不同,但诗歌表现的情感或体验却是共有的。讲解这些作品,首先,还是要了解知识背景,比方说,一首外国诗,作者是爱尔兰诗人,还是阿根廷诗人,亦或是英国诗人,要清楚。不同国别的诗人,文化上可能有天壤之别。它的文化背景、价值观念,最好给学生介绍一下,一定要让学生知道一位英国诗人和一位中国诗人,他们在写作的时候,其实有很多东西不同,这种不同,既与文化传统有关,也与现代历史处境相关。即使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位诗人,他的不同诗作,也因历史情境不同,而有文化上的差异。所以,讲外国诗,一定要把这个文化差异讲清楚;还有,表达的方式、方法不一样。诗歌中什么样的句子是富有诗意的,不同的文化圈的人,其认知不一样,这就需要比较了。如何比较?我们教材中的外国诗是翻译过来的,是汉语写的外国诗歌,那不是地道的外国诗,因为,你是用汉语翻译的,其实是一首汉语诗歌,不能叫做外国诗歌。我们需要在比较之中辨析其特性,辨认其诗性。

黄旭午:对,它是翻译来的。

方长安:翻译时,能不能完完整整地把那些原诗里面诗意的东西表现出来?显然不完全可能。所以,讲授部编教材雪莱的《致云雀》,如果有条件的话,你可以把这首诗的原语诗歌找出来,比较着给学生讲,这个方法就比较好了。讲雪莱的诗,首先要了解诗人雪莱,其次要了解他的原诗,然后要了解汉语特点,只有在比

较中,才可能让学生有一个全面的认知。外国诗的比较教学,其实还是英语教学,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体会到,从艺术的角度,把英语诗歌转换成现代汉语诗歌,有直译和意译的区别。从差别中,让学生感知:文化的韵味是否出来了?诗意、诗性的东西是否存在?这样,就能把学生带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。如果让你讲授一首翻译成汉语的外国诗歌,确实不太好讲,因为它不是地道的外语诗歌。在上世纪初,那种翻译诗歌,很多人是把它当成中国诗歌来看待的,比如胡适,他自己翻译了一首外国诗歌,题为《关不住了》,他曾经讲这首诗歌是他自己新诗成立的纪元,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翻译的这首诗歌就是他自己写出来的诗,是他诗歌成立的一个标志。他把这首翻译过来的诗歌看成是他自己的作品,有没有道理?其实也有道理,但是,站在今天角度来说,也没有道理。你能将自己翻译的一首雪莱的作品说成是自己的作品吗?肯定不能这样说,大家会说你是剽窃。在1920年代出版的一些诗集里面,诗人把自己写的和自己翻译的诗放在一起,他们的意思是这些翻译的外国诗歌就是中国诗歌。翻译成汉语的外国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国诗歌,因为,汉语是几千年来慢慢形成的,里面所积淀、所包容的是我们的民族传统,每一个词,每一句子,所承载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文化,它承载的内容和外文诗里面的内容不是完全对等的,所以,这里面涉及的问题比较多。但是,如果我们大家对比着去讲,那学生就会明白,而且他可能对诗的理解就会清晰很多。现在中学里面年轻老师,很多外语基础比较好,不妨采用这种方法。

黄旭午:今天采访方老师,让我们从新诗传播、教材编写、新诗解读、新诗教学、新诗创作诸多方面收益匪浅。谢谢方老师!